

◆“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四十九

商丘古国史记

青铜器上的宋国(下)

主讲人

马媛媛,女,汉族,河南开封人。201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任教。先后讲授古文字学、考古发现与华夏文明、中国文学史、消费心理学及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等课程。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目前已在《中国农史》《西南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贵州文史丛刊》等核心期刊发表了数篇论文。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等3项,参与完成教育部项目1项、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等省级项目3项。



宋景公嫁妹陪嫁铜簋

【阅读提示】

一对铜簋记录了宋景公嫁妹于吴国的历史,疑尊、疑卣印证了西周早期殷遗民及殷商诸侯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这些,都是在文献记录中被遗漏的历史。这些与宋国历史相关的青铜器的被发现极大地充实了后人对宋国的理解,丰富了后人对宋国的想象。但可惜,这些青铜器还是太少了。马媛媛老师说:“宋国青铜器数量不多,这与宋国地位极不相符,希望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能够出现更多的宋国青铜器,从而为宋国史研究填补更多的空白。”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其他地区出土的宋国青铜器

在宋国之外的其他地区,也曾出土过宋国青铜器。可能有人好奇,这些宋国青铜器为何会在国境之外出土?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青铜器基本上是由宋国女子出嫁而带至他国的媵器。

1978年至1979年间,信阳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出土了宋景公嫁妹所陪嫁的一对铜簋。簋上铭文为:“有殷天乙唐孙宋公栾作其妹句吴夫人季子媵簋。”

“天乙”指的是商汤的庙号,甲骨文中写作“大乙”。“唐”即“汤”,也屡见于甲骨文。“有殷天乙唐孙”是宋国国君的自称,这种称法还见于宋公鼎中,可见这是宋国国君常用的自称。宋君这样称呼自己是因为宋国的始封君微子启是殷王帝乙之首子,因此所有的宋君都可以称自己为商汤的子孙。“句吴”乃吴国国号。按照伯仲叔季的排行来看,“季子”应是宋景公的小妹。由此可见,宋景公将自己的小妹嫁到了吴国当夫人。

这一对铜簋是宋景公嫁妹于吴国的媵器没有异议,但学术界关于宋景公嫁妹给了谁争议很大。吴宋的此次联姻,史书失载,这件婚事既然是兄长宋景公出面,时间则应该发生在其父宋元公去世之后。宋景公在位44年,相当于吴王僚、阖闾、夫差三位吴国国君在位期间,那么这位句吴夫人应该嫁给了哪位吴王呢?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认为她的夫君应是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其理由在于根据时间推算宋景公的妹妹不可能嫁给夫差及王僚:宋景公的祖父宋平公在位有44年之久,他的儿子宋元公即位时不会太年轻,他的小女儿也不一定是在他的暮年所生,而夫差为王时宋元公已经去世22年。古礼女子二十而嫁,如果宋景公嫁妹于夫差只有在她是宋元公的遗腹女,又待字闺中逾期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这种情况可能性较小。而且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证明吴王僚的夫人是蔡昭侯的长姊,铭文作器时间是“元年正月”,蔡昭侯元年是吴王僚九年,距王僚的去世不足4年,除非在这4年中蔡昭侯长姊去世,宋景公之妹才有可能嫁给吴王僚。因此,吴王僚也不会是宋景公之妹的夫君,只有吴王阖闾最有可能。

从时间及各位当事人年龄上来推断的话,李学勤先生的这个结论是较为客观的,但唯一不能解释的是吴国国君

夫人的陪嫁媵器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固始。要知道这一地区自春秋中叶便属于楚国,吴国夫人怎么会埋葬到楚国呢?李学勤先生认为侯古堆墓葬所葬女子未必是吴国国君夫人,他假设了两种可能性:吴灭亡后董流落到楚人手中;公元前505年阖闾伐楚兵败,其弟夫概偷偷回国发动政变自立为吴王,阖闾急忙率兵回国,夫概失败投奔楚国,宋景公媵器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政变中流落到河南南部的。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赵青云先生认为宋景公之妹的夫君应该是吴王阖闾的太子夫差,而非阖闾。他认为当时只有吴太子夫差与宋景公的小妹年龄相当,这位句吴夫人之所以被葬于楚国,应当与吴太子夫差伐楚有关。《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光阖闾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都。”《左传》也记载:“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因侯古堆墓处于番国故城郊外,当时的情况应是吴太子夫差取番之后,携夫人占领番地时,夫人发急病而死,不得不葬在此地。

而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王恩田先生却认为宋景公媵器出土于固始,是因为宋公栾之妹季子曾嫁于吴王为妻,由于夫死或其他原因又改嫁于郢国国君成周。

这些学者提出的各种说法虽均言之有理,却又都没有办法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进行印证。宋景公之董证明了春秋末年吴、宋之间的政治联姻情况。当时的吴国野心勃勃想要称霸中原,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就需要与中原诸国加强政治联系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且宋国处于吴国北上的必经之道;而宋国在整个春秋时代的政治活动就极为活跃,面对日益强大的吴国自然希望能够结成政治联盟。因此通过政治婚姻加强两国的政治联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宋国故地因多年的黄河水患而鲜有青铜器出土,陪嫁媵器却因宋国女子的远嫁他国而得以幸存,几千年后出土于女子所嫁之国或其他地区。这些青铜媵器不仅是宋国与其他诸侯国联姻的实物证明,也是对文献记载宋国政治史的重要补充,以上两件青铜媵器所反映的信息便是史书失载的。

涉及宋国历史的青铜器

历史研究中涉及宋国的青铜器,还有一类虽属他国但铭文内容却涉及宋国。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流落海外的疑尊、疑卣。

疑尊、疑卣是西周早期青铜器,曾于2011年6月在法国科雷兹省萨朗镇的希拉克博物馆展出,并收入展览图录《东波斋中国青铜器和金器》。综合器形、纹饰及文字特征来看,其可能属于周成王时代。这一对尊卣造型华丽,器物等级极高,这说明器物主人的身份极高。更难得的是器物身上还铸有45个字的铭文,铭文内容居然涉及了6个人物、4个诸侯国名或地名,特别是记录了“纳鄂侯于螯城”“诞胤□于宋伯”两件重要史实,传递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

这45字的铭文为:“唯仲羲父于纳鄂侯于螯城,诞胤□于宋伯。公妣呼疑逆仲氏于侃。丁卯,疑至告,蚩赏贝,扬皇君休,用作父乙宝尊彝。”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铭文中的“□”并不是字体缺失的意思,这个字很完整,是“颀”的左边部分,读作“yí”,一些专业字典中解释其“通颀”。此字为金文首见,可能为给养的意思。因为这个字在普通字典中查不到,字库没有收录,权且用“□”代替。

经过学者董珊的释读,这段铭文可通读为:仲羲父往纳鄂侯于螯城为君,遂赠蚩“□”给宋伯。公妣呼令器主疑在侃地迎接仲羲父。丁卯,疑完成任务归来复命,公妣赏赐贝给疑,疑颂扬皇君美好的赏赐,于是作了祭祀父乙的这一尊卣,以为纪念。

疑尊、疑卣的器主是疑,铭文主要记载了疑受赏赐的缘由:仲羲父送鄂侯到螯城为君,疑接受公妣的命令迎接仲羲父,公妣因疑完成任务而赏赐了他。从内容上来看青铜器与宋国联系不大,只是铭文记载了仲羲父在送鄂侯时还赏赐给宋伯“□”,这就将宋国在西周早期的历史牵涉进来。

宋国在西周初年的政治地位较高,爵位为“公”,在先秦史籍中称之为“宋公”,但在疑尊中却称之为“宋伯”,这一现象值得关注。从年代及名号来看,受颀者宋伯应该是西周早期的宋国国君微子启,称其为“伯”,可能并非是爵称。据学者董珊推测,此“伯”可能为排行,也可能诸侯之长“方伯”的意思。

比“宋伯”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仲羲父“诞胤□”于宋伯”。宋伯和器主疑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因为仲羲父而将“纳鄂侯于螯城”“诞胤□”于宋伯”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深入分析仲羲父、疑、鄂侯、宋伯之间的关系,便可推知殷遗民及殷商诸侯在西周早期时的政治活动情况。疑称自己已去世的父亲为“父乙”,“乙”为其父之日名,这是典型的商族习惯,疑的身份应该是殷遗民。疑称公妣为皇君,公妣对疑进行赏赐,那么疑极有可能是公妣的家臣,这个公妣应是比疑地位更高的女贵族,她很可能也是殷遗民。仲羲父“纳鄂侯于螯城”应该是协助鄂侯进行迁徙,结合西周初年政局变幻以及西周统治者对于归附于商的诸侯的处置来看,此时的鄂侯很可能是受到周统治者的处置而被迫迁徙。

宋与鄂都曾效忠于商王室的诸侯,宋微子与鄂侯在商纣王时都反对纣王暴政,虽然周克商改朝换代,从铭文来看宋、鄂在经过新的册封及迁徙后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仲羲父与鄂侯、宋伯的关系应该非同一般,遗憾的是因缺乏确凿证据,他的身份尚难以确认。虽然分析中猜测较多,但铭文的诸多线索表明西周早期殷遗民及原属殷商阵营的诸侯之间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疑尊与疑卣是研究西周初年政治史的重要的出土文献资料。